

·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主持人:陈启能)·

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

——兼论近代中外关系的几种研究模式

胡波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 528402)

[摘要] 近代香山买办群体的产生、形成、发展和转化的历史,正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互动的历史缩影。在中西文化碰撞中,香山买办因势而动,因时而变,以香山人特有的开放包容、务实进取、开拓创新、重利而不轻义,以积极的态度大胆任事,勇于担当,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抓住机遇,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以思想和行动,促使尘封已久的中国,开始了近代文化的破冰之旅。

[关键词] 香山买办; 中西文化; 反应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11-0025-12

一、买办研究与近代中西文化关系史的新视野

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对它的审视与判断因此也见仁见智。有的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定格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回应”这一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裂变,并向近代社会演变。^[1]有的则认为在中西相互碰撞中,西方的冲击固然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但没有中断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里程。^{[2](P12)}他们强调,“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3](P178)}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更加具体地指出欧洲接触亚洲,不仅是欧洲对亚洲的冲击,而且也是欧洲面对来自亚洲的冲击,即欧洲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自身规律运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欧洲虽然将这一亚洲市场纳入世界市场,但后者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据相应的位置,并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4]因此,他们主张“以中国为中心的內部取向”,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眼来研究中国,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同时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3](P165)}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有的学者试图用“先进的西方与侵略的西方”的双重挑战和中国人学习西方与抵抗西方的“双重回应”模式,重新诠释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但仍然走不出“冲击—回应”模式的阴影。^{[5](P1567-368)}这几种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的模式,都只能是观察与分析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的一种视角和方法,不可能在完全意义上重绘中国近代史或中西关系史的全息图像。而且,采用其中任何一种研究模式,都难以对复杂多变的近代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中的某些现象进行完整而又深刻的解读。

买办和买办制度,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对他们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

收稿日期:2006-09-10

作者简介:胡波,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授。

在民主革命时代,出于政治斗争和革命的需要,买办和买办阶级被列为革命的对象。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就近代中国的买办的整个历史而言,他们有发展的阶段性和多样性。香山买办属于19世纪中国被迫对外开埠后的条约口岸的早期买办,他们在性质特征上有很多特点,因而需要结合当时的时空条件对他们在中西关系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做更多的具体的分析。

受传统评价的影响,长期以来,买办和买办阶级一直处于被批判、被否定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改造中国的产物,没有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就不会有半殖民地的买办;而没有买办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买办商人与买办资本,就不会有买办资产阶级。^{[6](P18)}有的认为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桥梁。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转化,曾经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7](P175)}有的甚至认为买办作为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人,对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战略性的重要作用。^{[8](P238)}虽然以往的买办和买办制度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民族爱国主义和政治斗争的立场转变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全方位探索,但受资料、方法和观念的影响,对买办的各种活动,思想观念,历史和社会作用,以及地域分布和文化特征等,依然缺乏更深入更细致更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冲击-回应”模式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内部取向”模式观照下的买办和买办制度,都有遮蔽事实或歪曲历史的可能。因为它们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说话,强调的仍然是自己特定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或中西关系史。总之,“中国中心观”和“欧洲中心观”的观察方法与研究模式,均不能涵盖近代中西关系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全部内容,近代中西关系史仍然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空间。

选择“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作为本文讨论的主题,目的在于说明近代中国买办和买办制度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形态的多样性,文化性格的混合性,历史作用的多重性,还在于为人们重新考量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提供更加生动具体的例证,从而对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作用、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消化力和竞争力,作一次新的历史审视。

二、开放融通的文化传统与香山买办群体的产生

几乎所有研究近代中国买办和买办制度的人,都注意到买办的地域性和群体性这一特点。最具代表性的、对近代中国买办进行过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郝延平,就在他的相关论著中多次指出:“绝大多数中国买办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以前,都是来自广州的。此处的广州系指广州府,在行政上包括14个县,其中半数地区不近海,而另一半地区,包括香山、南海和番禺,则是大多数广东买办的故乡。”^{[8](P13)}“在广东买办中,许多人是香山县人。它是个半岛,既近广州又近香港,也是中国早期国际贸易中心之一——澳门的所在地。‘香山人’这一名称甚至被看作是‘买办阶级’的同义语。”^{[8](P24)}类似的还有美国学者顾德曼教授的研究。顾德曼在他的《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一书中,也特别注意到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的上海所产生的影响。她说:“许多买办是香山人,香山是珠江口的一个半岛,邻近广州和香港,在早期国际贸易的中心澳门的南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香山人擅长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和同乡接替他的位置。在19世纪60-70年代,在上海有财有势的广东买办有徐宝亭、林清(阿康,Acum)、郑观应、唐景星和唐茂枝兄弟,都是香山人。”^{[9](P4)}国内也有少数学者试图对香山买办群体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进行社会学、文化学和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的分析,如惠莉教授在她的《郑观应评传》中对香山买办群体进行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探索,在肯定香山买办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了香山买办自身难以超越的局限。^[10]但更多的研究和评论不是夸大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制性和侵略性,就是指责买办个体道德观念的缺失和为人处事方式的非中国化。对香山买办群体产生、形成、发展和转化的原因与文化性格等的评价,仍然语焉不详^[9]。

其实,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异军突起,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既是内因和外因相互激荡、相互推动的结果,又是远因和近因前后关联,一脉相承的历史必然。

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出海口外伶仃洋上一个较大的岛屿。远古时,五岭以南,珠江口外,岛群簇簇,其中有一大岛,岛上山脉蜿蜒,主脉间有五座高峰,产木犀(桂花一种)、岩桂,后人称之为五桂山。又因该岛“多奇花异卉”,“多产芝草菖蒲”,“神仙茶丛生焉,色香俱绝”,故称香山。^{[11](卷1907,广字 风情形势)}秦汉时期,香山岛仍然是南海郡番禺县南端的一个荒岛。《永乐大典》也说:“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12](P4)}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少数中原人辗转迁徙至此,以岛为家。到了隋唐时期,香山岛已经出现“家世殷富,骑僮布满山谷,皆纨衣鼎食”的大地主郑愚家第,以农业生产为主、鱼盐业为辅的生产

方式,使香山岛开始摆脱“南蛮”的落后状态。^{[12](P7-8)}南宋绍兴22年(1152年),香山建县定县址于水陆交通方便的石岐。当时县城“东南山陵,西北水泽,设治于屿北,而四围皆海,居然一小蓬岛也。大尖胡洲笔峙于前山为望,乌岩、香炉屏障于左以为镇,龙脉拥入县治,隐而不露。登高而视,襟带山海,真岭表之奇境也。西有象角海口,北有县港海口,潮则弥漫巨浸,汐则浅隘难渡,虽近外海而无番舶之患,此实溟海咽喉,自然无险,广郡之要津也。”^[13]宋元时期的香山县,也不过是南海、番禺、东莞、新会四县濒海交界处的一些岛屿组成的下等县,与大陆尚未完全连成一体,四面依然环海。依山抱海,既是香山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障碍,又是它赖以存在和稳步发展的基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和水成了香山人最早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山成为农耕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而水则成为渔盐工商业产生的条件。尤其是北方长期战乱,大批移民南下,既带来了先进的江南水田耕作等方面的生产技术,又成为垦辟水乡的生力军;移入的江、浙、闽、赣诸路商人,手工工匠,也成为香山从事工商业的先民;宦宦的入籍,则带来了中原封建文化。所有这些因人口迁移实现的文化传播,对香山及附近海岛的开发和社会的形成均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香山仍四面环海,沙滩形成不久,可耕良田较少,粮食产量不高,大多数人仍然以捕鱼、晒盐为业,所以人称“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其估利有至十倍者。”^{[14](卷十五《征雅考二·盐铁》)}清乾隆年间出版的《香山县志》亦说在这一时期“东南盐务纷繁,而香山为产盐之区。”^{[15](卷三《盐法》)}渔、盐业的兴旺也推动了香山商贸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宋代,香山的村落增加到83个,人口达万户。随着西北江口淤泥不断淤积和人们持续的围海造田,元、明时期香山大部分地区出水成陆,变成大片沙田。元《南海志》有“象山角,舟人视为险滩,后渐淤为田”的记载,这就表明在宋、元时期,香山石岐西北的象角尚未与陆地相连。到了元代后期,在五桂山的周围已有了大片的沙田可供耕种。明代开始浅浮的中山坦洲,到光绪年间(1875-1908),“蚶洲周围八九里”,“西临大海,弥望稻田,万绿无际”。^{[16](卷四《輿地上·山川》, P19)}中山的鲟鲤沥,光绪时已经是“海门内沙田日淤,昔之浩荡而去者,今则曲折回薄而不能达。鲟鲤沥适当喉咽之冲,沥以南卤渐退,而田日美”。^{[16](卷四《輿地上·山川》, P31)}离香山县治50余里的横档山下之镇南村,“自乾隆己卯始有民居”,到道光时(1821-1850),则“今沙田日高,海水不溢,生聚渐繁”。^{[17](卷一《輿地上·山川》, P79)}清代珠江三角洲很多地方仍以沙命名,以海取名,就保留了沙田延伸的历史痕迹。^{[18](卷五十四《杂记二:下番禺地方·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诸村多以洲名》, P9)}也印证了香山曾是一个沧海变桑田的地理变迁的过程。到清朝,大片沙田开垦成可耕的农田,“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桑基鱼塘连环生产模式得到推广,小榄一带和附近南海、顺德农村,已连成一片桑基鱼塘的专业产区。农产品、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北部东海十六沙农村的许多墟市进一步发展为交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乾嘉至道光时期,80多年间有税土地增加77.2%,人口增加26.7倍,从而使香山“户籍殷繁,驾出他邑而上,洵广属之沃土奥区”,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同列大县”。^{[17](卷一《輿地上·山川》)}小榄岗头村,乾隆年间(1736-1795)已是“林步酒家,灯烛辉煌,彻夜不灭。”^[19]农业、渔业、盐业的专业化生产也有力地推动了香山商贸业的发展。商贸的繁荣,又反过来促进了农、渔、盐的生产。早在明代,香山就初步形成了“农人以殖百谷,灶人以办盐额,织人以成布帛,牧人以蕃兹畜,园人以毓草木,渔人以备鲜错,猎人以储皮腊,市人以售酒食”^{[13](卷三《民物志第二·食货》)}的分工合作的农商并重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宜农宜商的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使香山人较其他地区的人更早地形成了重农而不轻商,积极发展农商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务实开放的价值观。

这种重农而不轻商和务实开放的精神传统之形成与发扬光大,还与香山本土文化的功能结构和本质特征有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的香山文化,实际上是土著百越文化、中原文化、西洋文化和南洋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秦始皇统一北方后,于公元前214年派屠睢带兵50万,征战岭南,驻兵五岭,并与当地百越民族相融合,使岭南相对落后的文化与中原先进文化有了第一次交融。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公元4世纪),导致了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迁移岭南。香山地处海隅,往往成为他们迁徙的终点。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由于官军追杀私逃出宫的苏姓贵妃,使定居南雄珠玑巷的13姓96户人家结伴逃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有相当部分落籍香山,^[20]并与当地土著民族相融合,逐渐成为香山文化的主流。南宋末年,宋端宗及其部属兵败逃奔香山。南宋覆灭后,大批宗室和部属的后裔又流寓于香山,这又为香山带来了较先进较发达的中原文化。元大德《南海志》曾说:“大抵建安东晋永嘉之际至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广者众,由是风俗变革,人民繁庶。至宋、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甚至有人认为“建安以后,中原人士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于是衣冠礼度,并同中州。”^{[11](P239)}《小榄麦氏族谱》记载:“自宋南渡后,我麦姓五必公均南迁广州,而必达祖遂至黄圃,甫抵其境,见西沙高峙,石门迴开,溪深悬泻,土沃泉甘,谓此诚避地。遂相比隰,筑室而居。”而且“捐钱十万,立石基以防水患”,开始在黄圃地区经营沙田垦殖。

明清时期,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香山文化又与西洋文化发生碰撞。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后,这里不仅成了西洋物质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也是商业、政治、宗教与科技等精神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基地。西洋文化的渗透,为香山和岭南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得地近之利,香山人倍受西洋文化的熏染,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均比内地较早地发生了新的变化。天圆地方和“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中国中心观开始动摇,西洋政制、科技、宗教、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长处,也为大多数香山人所了解,走出国门、探索世界的冲动和求新求异求强求富的欲望,也不断增强。^[21]移民社会,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孕育了香山人的冒险、拼搏、开拓、进取的文化性格,也催生了香山人的商业经济观和文化教育观。

受长期中外通商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香山人自明清以来开始向海外拓展。尤其是清朝乾嘉时期,香山人放洋东南亚,在那里开荒垦殖,艰苦创业,不仅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家乡香山带回了南洋文化,^{[22](1247-248)}香山文化因此又打上了南洋文化烙印。侨乡文化的特点和侨乡社会的风貌,由此可知。

从历史上看,可以肯定地说,香山社会既是一个典型的不断移民的社会,又是一个文化输入型的多元文化组成的开放融通的社会。^{[23](P7-18)}在这样一种开放融通和文化多元的社会里,香山人比内地省份的人更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浓厚,实用理性突出,具有强烈的开放务实精神。同时,香山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和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香山人敏感灵活、敢于冒险、富于创新的文化性格。但是,长期受商贸经济环境的浸染,也使香山人文化性格中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市侩性。浓厚的商品意识和注重功利的思想倾向,弥漫于香山人的日常社会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着香山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同时也构成了香山买办群体在近代中国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

香山买办群体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和形成,还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和香山买办群体的文化自觉,以及他们与西方商人在商贸活动中的相互调适等因素有关。换句话说,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中西双方互相调适的过程。香山买办群体正是中西双方在交流互动过程中,相互调适、彼此合作的产物。

中西经济关系,在鸦片战争以后自然受到不平等条约的规约和各种政制的保护,但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中外商人共同所面临的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鸦片战争前,中外商事活动“就不可避免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歧、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既要贸易,又要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通事、买办、银师”。^{[7](P176)}鸦片战争后,外商拥有新辟的口岸,面对着的却是陌生的市场,不同的语言(五口通商的地方语言都各不相通),复杂的货币计算,互不了解的信用关系等等,摆在买办面前的亦是不测的风险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歧视或敌意。而且,对于欧洲商人来说,他们的能力、权限和作用也是有限的。^{[24](P111)}

首先,西方势力,尤其是欧洲商人面临的是中国的商贸传统和经济制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渐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及以此两个贸易圈为两轴,中间加以几个贸易中转港的亚洲区域内的亚洲贸易圈。欧美各国为寻求亚洲的特产品,携带着白银也加入到这个贸易圈中来。并在此加入的过程中与亚洲既存的贸易圈发生关系,英、印、中三角间贸易关系就是其表现之一。”对西方商人来说,了解中国多得异乎寻常的商业惯例和社会习惯,似乎也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的。中国强大的行业性和地区性行会,因乡土观念和家族观念而加强,这更使西方商人在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同中国人进行贸易。^{[4](P59)}

其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复杂的方言和陌生的环境,成为西洋商人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和经济扩张的障碍。直到19世纪末,西洋商人还必须借助买办或通事来开拓自己的市场。英国怡和洋行大班F. B. 约翰逊在给同行威廉·克锡的一封信中就说:“在学会中国话以前,外国人也许没有能力应付困难,留意一下洋行的未来,我相信,那些要追随我们的人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话,将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他们对本地语言的掌握。”^{[8](P27)}

再次,中外商人彼此之间的信用问题,也限制了西方商人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因为受语言、货币制度以及条约等方面的限制,西方商人不可能直接深入中国内地去采购所需的货物,必须通过买办来完成。由买办携带大笔现款到内地去采购货物,相互间的信用就尤其重要。一位亲历者对这时期的内地采购情况报告说:“很大一笔款子委托中国人(买办)到内地采购茶叶和生丝,这在最近的上海和福州已成为一种习惯,广州在

较小程度上也是如此。这笔钱在外国人不能同去的内地,几个月不知下落;不过中国人真是诚实,受托人卷款潜逃的事例是罕见的。”^{[81](P34)} 1840年代后期,上海就已开始采用这种内地采购制度。1867年,中国海关的一位外国税务司对此也曾报告说:“交货之前事先订货的制度最近几年已经在很大范围内盛行,现在(外国)商人不再在市场上等待土产到来,而是由他们的中国雇员(买办)带大笔钱到乡下去,他们预付款项给(当地的丝)行,并同他们订立合同。”^{[8](P90)} 不过,正如小奥古斯丁·侯德所说:“公行制度不再存在的年代,外国人习惯于把大笔款子从福州送到乡下去采购茶叶,这笔款子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鸦片。”^{[81](P90)} 同时他又说:“二三月份大笔钱(又买办带着)送到乡下去……直到5月份才有各种茶叶送回来。这要冒很大风险。根据条约,我们无权在内地购买土产,如果发生损失,无法补救。”^{[81](P90)} 基于种种担忧,洋行逐渐建立起一套买办制度,以此来抵御商贸风险和拓展在中国的各种商贸业务。^{[8](P93)}

可以肯定的说,买办和买办制度是近代中西商贸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商人与中国商人相互调适、相互认同和彼此合作的产物。买办和买办制度,对洋商和华商来说,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也不可能完全保证各自在商业交往中的利益,甚至还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它从根本上损害了华商和买办的利益,对西方商人也并非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从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易记同怡和洋行涉讼事件”和“尤记同普列斯顿洋行涉讼事件”^{[7](P175-230)}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到,买办的地位和责任都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倘若他破了产,或发生渎职、贪污行为时,还没有赔偿损失的制度。19世纪中国的买办,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十分有用的角色,但洋商和华商对他们的动向一点儿也不可麻痹大意,稍不留意,都有可能带来许多的麻烦。因此有的学者就特别明确地指出:“买办问题的兴起,是由于英国商人对中国语言和当地商业习惯的无知。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他们一直完全依赖称为‘买办’的土著代理人,开展收购茶、丝、销售鸦片与纺织品等业务,并借以同中国商人进行结算。买办被看作‘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爪牙’,或被看作给条约口岸带来‘商业革命’繁荣的‘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商人都是一把双刃剑。”^[25]

尽管买办对于西方商人来说是如此危险的角色,但在上海和通商口岸贸易往来中,买办仍然被认为是花钱但最省事最省心的“代理人”。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香山买办的精明强干、务实诚信、兢兢业业、开拓创新,更增强了西方商人坚持买办制度的信心。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西方商人去新辟口岸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包括香山买办在内的广东买办,像食客一样跟着外商涌向各通商口岸去。当时西方商人去新辟口岸时,“通常带上他们的广东买办和其他雇员,包括厨师,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之间从前的关系,部分是因为广州伙食合外商的口味”。^[25]而且资金担保制度也有利于继续雇佣广东人为买办。五口通商以后,几乎每个买办都必须有人作担保,或者以押金担保。他们的保证人对于他们在商业交易上的诚实和资金偿付能力负有全部责任。由于粤商特别是香山商人,有着从商的精明头脑和重商的文化氛围,更有其他沿海地区所没有的中外通商的历练,多数人了解西方人的欲求和文化性格,都熟悉对外贸易,乐于与洋商交易,也希望在中外贸易中增强自己的实力,确保利益无损,在洋行需要更多的买办时,他们自然首先为他们的同乡作担保。1859年,一位西方商人在信中甚至说:“上海买办根本不可靠。不过他由我们第一次去上海时我们的老买办(莫仕扬在广州)作的保。”^{[81](P60)} 琼记洋行在福州设立分行时,莫仕扬又推荐并担保同乡唐隆茂为新买办。当唐隆茂忙于自己的商业不能履行买办职责时,他的兄弟阿启接替了他。^[8] 同样,怡和洋行香山买办林钦,在离职前亦介绍了香山同乡唐廷枢接任。唐廷枢在卸任前,又推荐了自己的兄长唐茂枝接任怡和洋行买办。像莫仕扬、林钦、唐廷枢等香山老买办那样,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或同乡接替他的位置。香山人徐钰亭早年在澳门经商时,与英商宝顺洋行的合股人T. C. 必理交往密切。《南京条约》签订和五口通商后,他随必理来到上海,成为宝顺洋行的上海买办。随后,徐钰亭又引荐并担保其弟徐荣村入宝顺行做买办。在徐钰亭、徐荣村的引荐下,徐氏家族的徐润、徐芸轩成为宝顺行的买办。徐润后来又陆续引荐了徐渭南、徐关大、杨梅南、徐叔平、郑观应等不少族人和亲戚同乡进入洋行当买办。^{[27](P12)} 就这样,在19世纪60—80年代,各通商口岸尤其是在上海,有钱有势的广东买办,几乎都是香山人。整个19世纪,香山唐氏(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莫氏(莫仕扬)家族、容氏(容闳)家族的买办,彼此引荐和相互作保,使族人、亲戚和同乡纷纷进入洋行做事,从而形成了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的近代香山买办群体。^[24]

可以说,香山买办群体,是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冲突、磨合、调适的产物。^{[23](P12-18)} 像过去那样,把它笼统地说成纯粹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洋奴”,是“汉奸”,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似乎流于简单。这是因为,一方面,香山买办群体在早期中西商贸关系中,凭借自己的地域和语言优势,有效地化解了

中西方因语言、制度、习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矛盾冲突,使中西双方在文化互不了解和互不适应的情况下,较顺利地走近对方,从而大大缩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距离,实现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历史发展;另一方面,香山买办群体也善于抓住机遇,扬长避短,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波谲云诡、深不可测的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创造性地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人生的大转折。

总之,一个以不断移民构成的社会,具有冒险、拼搏、开拓、进取的移民精神。移民社会具有高度的人口流动性,那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带来了各自的地域文化,并在移民社会中相互碰撞和彼此融合,从而使移民形成了一种开放兼容的文化心态。如香山县,闽、客、广府三大方言民系的共生和对外来语言的吸纳,就是典型的例证。在移民社会,人们与外界进行频繁的交往活动,自然而然地少了惧外、排外、自我封闭的心理,多了一些自由开放的活力,能力本位和实力取向在香山社会逐渐形成主流。这种能力本位和实力取向为社会所认同的结果是,人们比较注重个人的实力和创造潜能的发挥。移民社会,以其特有的移民精神和开放兼容的文化心态,必然孕育出香山人求新求异、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率先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新的思想观念,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先导。^{[28](P111)}可以肯定地说,移民社会和文化多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性格,是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迅速成长的基本条件和内在动力。

三、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反应

香山买办群体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形成、发展和转化,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他们自身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引起的一系列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也是其中最值得我们认真考量的因素。

做买办,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成为一名买办,尤其是一名《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的洋行买办,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夷情”,会说“夷语”。晚清小说《发财秘诀》中,买办陶庆云总结说:“洋人第一要会揣摩他的脾气,第二要诚实,第三也轮到说话了。”而且特别强调外语的重要性,他说:“倘使说话不能精通,懂了以上两层,也是无用的。我此刻虽算是东家偿脸,然而,也要自己会干,会说话才有今日啊!”《发财秘诀》第四回中的区丙看见“那小后生和外国人传话,齿牙伶俐”,便不禁暗道:“懂了外国话到底便宜……(我)后来代外国人做了一回探子,亦因为不懂话之故,由得关阿巨经手。我虽然发了点财,然而他那经手的,未免总落我两个”,想到这里,便“未免自悔当初不学说洋话了”。因此《发财秘诀》的作者吴研人感叹道:“欲识发财秘诀,先要审辩时机。两句洋泾浜话,到底落了便宜。”^{[29](P214)}虽然会“夷语”不是做买办的绝对条件,但至少是重要的前提。

香山人在近代中国纷纷进入洋行做买办,应该说首先得益于他们对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运用。香山自汉唐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后,香山人借助澳门及沿海岛屿,多从事海上贸易,“半通夷语”。清代通行的广东英语就是后来洋泾浜英语的前身。长期与外商做生意,使香山人对外语养成了一种难得的宽容和主动学习的习惯。

容闳父母就曾主动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学习英文。容闳因有一点英语常识而获利,几十年后他仍然对青少年时的乡村经历津津乐道:“当到较远的地方拾稻穗时,姐姐往往陪我一块儿去。当我拾得太少时,我却不能像古时的路得(Ruth)那样有波阿斯(Boaz)的帮助。可我的英语知识却帮助了我。姐姐告诉那个领头割稻子的人,说我学过英语,既能说能读又能写。这引起了那个割稻人的好奇心。他招呼我过去,问我能否说一些‘红头发人’说的话给他听。他说他还从未听过这种语言。起先我还觉得害羞和胆怯,但姐姐鼓励我说:‘他会给你一大捆稻子带回家去的’。姐姐的话一下子提醒了那个割稻人。他立刻变得灵活起来。他对我说,如果我肯说,那么他就给我一大捆稻子,重得我都搬不动。于是我背诵了英语字母表给他听。所有割稻子和拾稻子的人,都停下了活儿,静静地站在那里,他们都高兴地咧开嘴笑着。在泥水齐膝盖深的稻田里发表完了我的初次演说之后,我则获得了好几捆稻子的奖赏。因为稻子多得我和姐姐俩都拖不动,所以我不得不赶快去找两个男孩子来帮忙。这样,我满心欢喜地回到了家,将金黄色的稻捆交给母亲。我真没有想到,我学到的一点点英语知识在我的生涯中就真这么早地派上了用场,那时我不过12岁。即使路得幸得6簸箕麦子,其机遇也仍不比我更好。”^{[30](P6)}

容闳的这一经历,也就表明香山人对外国语言文字不但天生就没有抵抗的动机,而且还有着一一种欣赏的兴趣,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鼓励他人学习外语,了解外情。唐廷枢、唐廷植、唐廷庚兄弟也是被父亲唐宝臣送到容闳就读的马礼逊学校学习英文的。其主要动机虽然是教会学习可以免费上学,但也有实用价值上的考虑。^{[25](P77)}英语学习对于唐廷枢兄弟来说,无疑于人生事业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唐廷植1851年进入美国后,其英语学习的优势和作用就迅速显示出来。他不但把所有“花旗国”对“金山汉人采金条规”译成中文,“核实无讹”,公诸华工,而且用英文投书美国新闻媒体,反映华人意见,并且代表华人和美国加州州长进行

“面对面”的谈判^{[25](P78)},在美国华人中间享有了极高的声誉。唐廷枢不仅英文写得非常漂亮,英语也说得十分流利纯正,连外国人也称赞他“说起英文来就像一个英国人”^{[31](P69)}。当时香山人把学习外语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又有就近学习外语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学外语之人可谓趋之若鹜。唐廷枢就是因为同乡亲友常常向他求教英语方面的问题而感到十分的麻烦,于是在1862年根据所学所用的英语知识,用广东方言编写了一本《英语集全》,其中第六卷标题为《买办问答》,目的是方便人们学习英语和与外国人打交道。他在序文中就说:“因目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感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故复将此书校正。自知不足以济世,不过为洋务中人稍微方便耳。”^{[32](P82)}又说“洋务中人,多来问字,余见烦忧,用辑此书,以作闭门避烦之计”^{[31](P44)}。还说:“粤东通商,百有余载,中国人与外国交易者,莫如广东最多。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以便两相通用。”^{[31](P44)}由此不难看出,在近代香山社会已经形成了学习外国语言的风气,具备了与外商打交道和了解西方近代文明的基本条件。这种现象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其他沿海地区是不曾多见的。应该说,对学习外国语言的内在要求,以及与西方人长期商贸往来所具有的语言训练,是香山人19世纪洋行买办中占绝对优势的直接原因之一。

学习外国语言仅仅是充当买办的首要条件,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中外商贸业务是否熟悉。如前所述,香山县有经商的传统,尤其具有与东西方商人打交道的知识和经验。鸦片战争前,香山人就与西方商人有较长时间的商贸关系。^[32]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西方各国纷纷在中国新辟的口岸设立通商机构,开拓对中国的商贸市场。对此,香山人很快做出了反映。在努力学习英语的同时,积极寻找充当买办或中间人的机会。而洋行看重的也是香山人熟悉西方语言,精通业务,交游广泛,消息灵通等特点,于五口通商后大胆地起用香山人做买办。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就是因为早年在澳门经商时与英商宝顺洋行的老板相识而被雇佣为上海洋行买办的。^{[27](P2)}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由华南向华东的转移,具有经商传统的香山人表现出与西方人相似的积极态度,纷纷相邀从广州、香山、澳门、香港等地转移到上海等通商口岸。

1850年,不但徐润、郑观应兄弟这样的买办家族的第二代子弟,在父兄的提携和安排下走向上海,而且其他出身者,尤其是那些曾受过西方教育、具有对外交往能力及经验的年轻人,也纷纷由香港转向上海,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19](P27)}容闳1854年从美国返乡后先在香港殖民政府谋职,后于1856年到上海的海关和洋行任职。^{[30](P68-92)}唐廷枢、唐廷植、唐廷庚兄弟早年在香港、上海甚至美国加州等地做翻译或在海关任职,他们对西洋近代工商业文明,都表现出极大的学习热情。他们不仅熟悉商务,了解国际间的商贸知识,而且喜欢经商,积极参与近代商业活动。唐氏兄弟子侄,以及以郑观应、郑翼之为代表的郑氏家族成员,大都是在五口通商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后进入洋行,从事买办职业的新生代人物。他们会说英语,精通中外商务,思想相对开放。在当时的中国,他们是既熟悉中国商务又了解对外贸易的最典型代表。

五口通商后,西方商人想在短时期内了解中国多得异乎寻常的商业惯例和社会习惯,显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中国的市场行情、发行、流通、没有规则的旧式钱庄或票号,更使洋商不知所措。居住在天津的一位商人,回忆他在1860年第一次到天津时遇到的困难时说:“我作为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当时唯一的(外国商人),在上书崇厚一事中了解到,那里既没有标准重量单位,也没有同上海、广州的重量单位相对应的秤,也没有海关的重量单位,所有这些,都使我不得不在我的买办帮助下亲自处理。”^[8]因此,西方商人需要买办具有一定的商贸知识和经验。香山人学习洋文的同时,还独立经营自己的商号,因而很自然地成为中外商人相互沟通的桥梁。买办徐润、唐廷枢、郑观应、莫仕扬等,就不仅仅是主动地学习英语,了解外情,学会与西方商人做生意,而且他们本身就积极合股投资开办茶号,成为独立经营的商人。徐润先是同其师曾寄圃等合开一家绍祥字号,从内地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然后转卖给上海各洋行。接着在温州试办了议价润立生茶号,在江西的河口、宁州等地与人合股开设了福德泉、永茂、合祥记等茶号,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了立顺兴、川汉等货号。除经营丝、茶外,徐润还经营烟叶、皮油、白蜡、黄麻、白麻、桐油等外商需要的货物。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与人合股开设宝源丝茶土号,经营丝、茶和鸦片,还与人合股开设了敦茂钱庄和协记钱庄,办理存放款,开发庄票和兑换业务。同时还投资地产,先后与外商、华商合办过业广房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上海地丰公司、广益房产公司、宝源祥房产公司等,在房地产经营中大发横财,人称“地产大王”。^[31]唐廷枢亦是如此。他在怡和洋行的12年里,除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势力等经常业务以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推销鸦片、运销大米、食盐,甚至企图染指内地矿产的开采。^{[34](P1-17)}而且他自己也作为一名独立商人,在充当洋行买办的同时,还苦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意,积累了大量的资本。郑观应也不例外,他在做买办时,又以独立商人的身份经商致富。他的弟弟郑翼之,在任天津洋行买办期间为

太古洋行赚了不少钱,也有效地为自己发家致富夯实了基础。^{[25](P77)}

经商赚钱,在19世纪的中国,常为大多数人所不齿。香山却涌现出大批的家族式买办和买办商人,这显然与香山社会群体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取向有关。在洋行做买办,帮外国人做生意,甚至自己经商,在香山人的眼里,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他们这里接触西洋文明较早,对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较其他沿海和内地之人更深刻更直接,中国文化心理上的排他性也不甚明显。尽管近代香山人在与外人接触时,仍然表现出种种疑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西方人的日常交往和商贸关系。这就说明香山人对西洋文明的认识,有一个较理性的发展过程。

其实,香山人在近代中国纷纷进入洋行充当买办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香山人面对西方近代商业文明时,不是固执地回避,更不是敌对和抗拒,而是正视现实,以一种现实而又开放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接受西方商业文明的挑战。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文明、特别是商业文明的态度,比较积极,评价也比较客观,取舍也有一定的准则。郑观应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思想,最鲜明地说明了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文明做出反映的方式。作为一名买办,郑观应比同时代的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呈现在他面前的工商业在西方社会中的原动力作用。他在《商务》中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35](P60)} 强调“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35](P60)} 批评中国不但不重视商务,甚至还处处限制商务发展的政策,赞扬英国“在朝之士俱由商务而来,而商务遂甲于天下。我中国苟欲振兴商务,推广利源,曷取英国成法,仿行而变通之,以尽祛前弊”。^{[35](P61)} 且“各国每埠皆设商会,京都设商务总会,延爵绅为之领袖。其权与议院相抗,如有屈抑,许诉诸巴力门衙门。故商人恃以无恐。”^{[35](P60)} 他还主张设立商会,维护商权和发展商务,建议废除捐纳制度,使社会上有资财者“不捐官而为商”,使社会上“人将以商务为正道而黽勉以图,商贾中如有品行刚方、行事中节者,人必举以为议员以办公事,是求利中不失其求名之望,求名中可遂其求利之心。况官又众举而来,磊落光明,此捐纳者之婢膝奴颜声价百倍矣”。^{[35](P63)} 尤其是他有感于西方在中国拥有特权的“商战”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政治经济主张,在当时可谓最具震撼力。他说“西人不独立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二者关系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认为“商战”比“兵战”危险更大。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作为国家必须了解外情,审时度势,有计划地发展工商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包括工、农、矿业发展在内的十大商战内容。^{[35](《盛世危言·自序》)} 因此,为了中国的强盛,在上层官僚专注于军事方面的自强之时,郑观应等香山买办,则更倾向于发展现代新式工商业,改革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实用人才,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活力。总之,“郑观应的改革方案代表了条约口岸新崛起的商人的观点,而他的文化思想观念则明显地受到他的买办生涯的影响。这一事实可由他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来说明,诸如,他对西方冲击的解释,他对议会制度的建议,他关于强硬的国家主义与谨慎的对外政策相结合的倡议,他对于商业和工业的能动作用以及对新兴商人地位的合理化的强调。最后,他向中国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诸如家族主义和官吏的职责万能等。这种知识不能由研读儒家经典而获得,相反,这是他作为一个买办而同外国人交往的结果”。^{[8](P257)}

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文化的另一个反应,就是他们在看到西方“商战”对中国的危害的同时,逐渐将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式企业,成为民族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家。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迫使他们从早期背离中国传统文化又走向了文化回归。郑观应曾说自己“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前一句话指的是任职买办的事情,后一句则是指参加官督商办的经历。就买办转化而言,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向官僚阶层转化,即纳资捐官,成为封建官僚中的一员;一种是向工商企业家转变,即投资新式企业,成为民族资本家。就香山买办的转化而言,主要是以买办资本为依托向官僚资本转变,成为封建官僚阶层中的组成部分。香山买办吴天显的兄弟吴健彰因懂“夷务”,成为中国第一个由买办转化为官僚的人。^{[36](199-52)} 徐钰亭、徐润、唐廷枢、唐廷植、郑观应、郑翼之等人全都因捐纳而拥有了道台官衔。^{[8](P224)} 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甚至应邀参加清政府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和经营,并担任商总、总办、会办等职。这是因为,他们熟悉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经营方式和中外商贸知识,了解和重视近代科学技术,以及先进设备在近代企业中的应用,有丰富的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

络，^{[8] (P171)}而且在储蓄和工业之间提供了某种有价值的联系。他们作为中介人在中国早期工业化关键时期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富有，而且在于他们乐意投资于新式企业。他们通过同外商的长期密切接触，认识到新式企业的重要性和诱人之处，因此在任何其他阶层的人形成同样的意图之前，就急于投资新式企业了。^{[8] (P264)}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能顺利筹集资本，不断地拓展业务，与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主的香山买办群体全力支持分不开。尤其是唐廷枢，不仅使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而且在开平矿物局成功地应用了现代技术，使其“逐渐变成了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8] (P175)}难能可贵的是，唐廷枢确信中国可以从西方技术中获益。直到1892年去世，他成功地管理了开平矿物局达15年之久。当时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对他十分尊敬，了解他的人对他的“现代思想”、“进步精神和博大思想”，以及他对“先进手段的真切的渴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8] (P176)}李鸿章委他总办招商局时，称他“精习船务生意”，^{[37] (卷十三《朋僚函稿》，P13)}以后在委派他主持开平矿物局时又夸他“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胸有成竹”。^{[38] (P7, P140)}同样，徐润和郑观应等香山买办的西学知识和业务才干，也受到洋商和清朝官僚的重视。^{[39] (P15)}李鸿章延揽唐廷枢、徐润入主招商局的意图，就是想达到“唐籍徐之财力，徐籍唐之才力”的目的，认为他们和衷协作，庶克有济，希望他们有效地实行资源整合，挽招商局于困厄之中。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处于外国轮船公司夹击中的中国轮船招商局，在唐、徐等香山买办的鼎立维持下，很快形成了与外国轮船公司并驾齐驱、三分天下的局面。^{[40] (P139-1370)}李鸿章因此称他们是不可多得的“熟习生意，殷实明干”的洋务人才。^{[37] (P24)}福州将军文煜在1876年5月26日的一封信中对香山买办的作用说得更具体：“兹查有办理上海招商局侯选唐廷枢，才识练达，气宇宏深。于各国情形以及洋文洋语，罔不周知，本年正月间因公来闽，臣日昌暂留该员帮办电线等事，措施悉合机宜，深资其力。”^{[41] (乙《福州船厂》，2，1686)}

从轮船招商局到开平煤矿、以及众多的近代新式企业的创办和成长，在给香山买办带来荣誉、利益、尊敬的同时，也遭受着传统社会的不理解和封建官僚集团的抵制。马建忠说：“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皆该商（指怡和、太古洋行）素所蔑视之买办，一旦与之抗衡，犹挟主奴之见，所以售地、租埠以及引用总船主，犹有主奴之见存也。”^[42]甚至说他们中饱私囊，任人唯亲，专横跋扈。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形是“官商积不相能，积不相信久矣……孰肯以自有之利权反为长官所执”。“故殷商大贾更多事者，明知其有利，每趑趄不敢应召。”^{[38] (P152)}在商怕官的社会里，香山买办资本在转化为民族资本时，利权受损也是必然的结果。徐润以买办商人的身份，挟巨资参加官督商办企业，曾与拥有官权的督办盛宣怀因利权问题多次交锋，但每次都“泰山压卵，谁敢异言”、“卵石之势无可如何”而宣告失败。^{[39] (P73)}唐廷枢以商董身份参与招商局和开平矿物局的筹办，除“将自己所有”入股外，并向亲友招募巨股，但死后“家道凋零”。^{[42] (P112)}

香山买办与众不同的另一特点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能从国家和民族利权出发，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近代工商业，与外人争利，实现民富国强。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创新精神，不仅开风气之先，而且还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增强了当时中国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信心，推动了中国工商企业的近代化。《怡和洋行150周年特刊》就对唐廷枢为代表的香山买办的作用与影响进行了相对客观的评价。^{[43] (P142-143)}

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反应，还见之于日常生活、家庭教育和子女择业之中。文化的交互作用，通常是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所谓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巨大的文化变革，归根到底是从平民百姓的日常活动中开始的。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反应，也体现在他们家庭日常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之中。在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他们一方面利用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完全责任制和个人保证制度，并且依靠家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形成的社会力量，在条约口岸与西方人周旋或抗衡；另一方面，他们也明显地受到西方契约和有限责任等观念的影响，能够按照合同、协议、国际法、社交礼仪等法律法规和礼仪制度行事。在近代中国，香山买办的兴起、迁移和社会交往，常常是以家族、亲戚、乡里之间相互联动的方式进行的，个人在家族、亲戚、乡里中，既分享着来自所属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又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其社会活动和事业拓展，仍然以雪血缘和地缘为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在事业拓展上“更像企业家——有效率、有进取心，深思熟虑，有商业头脑，注重市场，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具有冒险精神。在考察近代中国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时，人们就会发现买办商人作为创新者，风险承担者、资金提供者，以及能干的经理，是同样卓越的彼得式的企业家”。^{[8] (P226)}

香山买办在中国最早的大规模的轮运、采矿和纺织企业中的成功的经历，同其他阶层人们的反应迟钝相比，也是很突出的。传统商人很少参加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对于进入新的领域，他们往往极为勉强。如从前

的行商在商业方式改变之后,似乎很快就在社会舞台上消失了。传统的盐商、山西票商,也很少参与新式企业的资金筹集和经营活动。“红顶商人”胡雪岩和以日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对新式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缺乏兴趣,不愿在传统上有所革新以适应新的需要,因而,在西方近代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方式的冲击下,很快由盛转衰,甚至丧失了生存的机会。^[44]江浙和上海的买办们,在五口通商后的近40年内,虽然也于新式工商业的投资或经营方面有所表现,但其实力和影响尚不及于以香山买办为代表的广东买办。至于传统的绅士和官僚当中的部分开明人士,虽然也有发展新式企业的愿望,但是,他们在企业规划、成本结构分析、产品定价、市场预测、企业赢利之确定等经营管理方面,因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准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总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香山买办利用传统的和现代的地缘、人文优势,成功地实现了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从而在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生活和经营理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生活和交往方式上,香山买办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反应,也富有积极意义。他们创造性地将中西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衣着、住房、宴请、饮食、信仰和社会活动,其华洋一体的混合角色也颇招人耳目。徐润是晚清最接近西方社会生活的中国人之一。他在对西式日用器物 and 食品感兴趣的同时,对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心存偏爱。他终年“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45]其上海的寓所,从外观上看很不起眼,内部却别有洞天。^{[39](P231-233)}

可见,徐润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同于当时一般的旧式商人与封建地主、官僚、贵族,在饮食起居和家庭子女教育等方面,开始崇尚和接受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他在苏州河以北的另一处宅地却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这里泉石深邃,冬末春初,梅花绽香,春夏之际,池水如镜,初秋时节,晚香漫浮,徐润自己称之为“未园”,意为“拳山勺水未足言园”,景致与园名又表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27](P37)}而在其家乡香山北岭村所建的竹石山房(即愚园),则完全是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风格。^{[46](P52)}

徐润这种亦中亦西,“中”中有“西”,“西”中有“中”的生活方式,在近代中国买办群体中,颇有代表性。买办作为两种文化中介人的角色,可由冠以他们名字的建筑物式样反映出来。一位外国人回忆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情形说:“在很短的几年中,来自英国的砖瓦运来了,有阳台拱门的砖房很显眼地在(黄浦)滩前铺展开来……由于找不到外国建筑师,设计图是由外商绘制,由中国建筑师加以修改,使之适合本地材料和中国技术……这种常见于19世纪,华中和华南各条约口岸的建筑式样,被人诙谐而恰当地命名为‘买办式’”,因为这种名称乃因其中西合璧的方式所致。^{[8](P271)}《北华捷报》1867年8月5日亦有文称:“引人注目的楼房在上海建起来了,但是大厦目前还很少见。建筑风格用诙谐的广州老话来说,就是‘买办式’”。

在价值观、宗教信仰和思想认识等方面,香山买办表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倾向也比较突出。一方面,他们受中国儒、释、道以及地区性行会等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崇儒重道信佛,如郑观应、徐润等香山买办就特别迷信风水。郑观应晚年甚至沉醉于道家长生不老之术。而且香山买办大都具有官本位和封建思想倾向,言行和心理上夹杂着浓厚的仕宦情结,捐纳求官,富而入仕的价值追求,一直没有放弃。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许多方面与传统决裂,如反对女子缠足,理解异族间的婚姻,鼓励冒险进取,送子女到国外学习实用知识,而不是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以及安排子女进入洋行做买办或独立经商等等,都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抵牾。有意思的是,香山买办还对促进条约口岸的教育,以及帮助中国学生到外国留学感兴趣。1872年,由于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的倡导和努力,中国第一次派遣出国的留学生起程赴美。徐润受曾国藩等的委托,一直负责招收留美幼童的工作。^{[27](P28-39)}发生在1873年的杨月楼案最集中地反映了香山买办思想观念的复杂多样性。一方面,他们倡导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专制,遵守法律法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杨月楼一案之中,扮演着维护同乡族群的集体纯洁和封建等级秩序,以及男性对妇女的权威角色,对自由恋爱结婚的韦阿宝和杨月楼等,兴师问罪,大打出手。^{[9](P76-79)}在他们身上,既能捕捉到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的旧社会阴影,又能见到西方近代文明影响下的新时代曙光。因为买办,特别是香山买办的活动,在多方面涉及到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所以郝延平说他们是“边缘人物”的范例。所谓边缘人物是在种族和文化冲突时,新的社会、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正在出现,他们便是在这样的时刻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类人物。近代西方的扩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文化的国际交往和融合,在晚清中国的条约口岸,各种文化的汇合,构成一个典型的混合社会。这种迫使买办同时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社会,甚至两种对抗的文化中的情形,也导致他们“扮演没有民族差异的人和外来人的角色——这同他们生活在几个不同的世界有关。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必然成为见多识广,智力敏锐,并且更具独到的、明智的见解的人物”。^{[8](P275)}

四、香山买办:近代中西文化互动和调适的动力

香山买办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兴衰表明,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冲突与调适,转化与创新的过程。尽管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和对抗,民族文化和地方主义的泛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与西方各自坚守的大国中心取向和文化优越论,但是,无论是强者主动攻击弱者,还是弱者积极面对强者,也无论是文明征服野蛮,还是先进改造落后,近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只能是在各自的历史与现实基础上展开,而不是谁影响谁,谁决定谁,谁吃掉谁的简单问题。

因此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双向互动的历史。对于“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过去虽然已经有较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但是更多地是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因此,见到的只能是血与火的悲惨场面,想到的是爱国保家,维护的是独立与尊严,表现的是愤怒与声讨,最终便是对“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做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诚然,最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从“挑战与回应”、“冲突与融合”、“交流与传播”、“互动与调适”等角度去思考,但毕竟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没有引起史学界广泛的共鸣。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人们长期习惯于单向思维和道德判断,很难一下子改变认识和转变态度;二是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的提倡者们还没有足够影响力的著述问世,理论缺乏实证性的说明,人们很难一下子被说服。尽管如此,这些新观念的提出,毕竟为近代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更新了人们的历史价值观。试想,如果按照知识论和价值论而非道德论法则去裁决和评价“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问题,如果立体性和双向性地而非平面性和单向性地去看这一问题,那么,“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也就是西方文明向中国渗透传播和中国人学习模仿西方、调整适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过程。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可以说大都与西方的冲击或“世界走向中国”有关。沿着这一思路去分析研究中国近代史,无疑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历史本质的认识。

至于“中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过去,我们只是看到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屈辱地位,却没有想到在被动的同时,中国也走向了世界。一方面,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也走向了世界;另一方面,民族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和国力不断增强的近代中国,也逐渐依照自己的意志和独特的风格,坚强有力地走向世界。^[47] 尽管“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历史主题,在近代史上与“世界走向中国”这个主题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和苍白无力,然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毕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更何况这一现象处在递进上升和不断加强的趋势之中,它的作用和影响显然不能低估。过去,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世界走向中国”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只强调列强的侵略性与中国任人宰割的被动性和软弱性,而低估了中国在近代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其实,在近代国际关系中,中国的存在和独立,无论是对外国进入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义和团运动,使列强看到了中华民族潜在的能量。他们变“瓜分中国”为“以华人治华人”的政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被动挨打的现实,但在当时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卫自救的办法。因此,沿着“中国走向世界”这一思路去研究近代史,也许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会有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东西被重新发掘出来。^[48]

19世纪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无疑是中国与西方相互关系发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桥梁和推动力。没有他们,中西关系也许还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但是,有了他们,近代中西关系就变得更为丰富和精彩。近代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展开,部分地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对于当时买办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与影响,郝延平先生的评判就比较客观,也耐人寻味。他说,总的说来,他们“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人,他们活动于中国和西方之间,在近代中国起到了突出的战略性的重要作用。从经济上说,暴发户买办是唯一一把财富与专长集于一身的人,因而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带头力量之一。他们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角色属于商业绅士,并充当了条约口岸的社会贤达。从文化思想方面说,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的思想和看法,所以当他们成为新思想的倡导者的时候,结果也就成为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挑战者。他们对西方做出反应是基于他们对中华帝国之外的世界的理解。这不是因为他们较少喜欢中国的传统,而只是他们更了解西方。所以,他们是典型的‘边缘人物’,而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他们既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对不同的文化施加影响。他们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交融和混合于一身的文化混血儿。中间人物通常不是中心人物,但在19世纪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买办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他们扮演的东西方中介人的角色上。”^{[8](P274)}

香山买办群体的产生、形成、发展和转化的历史,正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双向互动的历

史缩影。他们因势而动,因时而变,以香山人特有的开放包容、务实进取、开拓创新、重利而不轻义,以积极的态度大胆任事、勇于担当,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抓住了机遇,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以思想和行动促使尘封已久的中国开始了近代文化的破冰之旅。

参考文献:

- [1][美]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之回应[M].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
- [2]张耀美.也谈中国近代史前进发展的线索[J].历史研究,1984,6(12).
- [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4][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5]陈胜.对西方挑战的首次回应——鸦片战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 [6]聂宝璋.聂宝璋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7]汪熙.求索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8][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
- [9][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0]易惠莉.郑观应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1]永乐大典[Z].
- [12]银铠.中山邑史考[J].中山文史,37,(4).
- [13]香山县志[Z].明嘉靖年间本.
- [14]马端临.文献通考[M].
- [15]香山县志[Z].清乾隆年间本.
- [16]香山县志[Z].清光绪年间本.
- [17]香山县志[Z].清道光年间本.
- [18]番禺县志[Z].清同治年间本.
- [19][清]何太佐.榄屑[M].
- [20]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C].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 [21]黄启臣.澳门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 [22]中山市志[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 [23]刘志山.移民文化与市场伦理[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 [24]周见.中日两国近代企业家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25][日]本野英一.19世纪60年代上海买办登记制度的挫折和出口贸易体制的改变[A].近代中国:3[C].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
- [26]徐矛.中国十买办[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7]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J].史林,2004,(4).
- [28]杨国明.晚清小说与社会经济转型[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5.
- [29]容闳自传[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 [30][美]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J].清华学报,1961,(6).
- [31]陈平原.大英博物馆日记[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 [32]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 [33]汪敬虞.唐廷枢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34]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近代天津十大买办[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 [35]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36]梁元杰.上海道台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7]李文忠公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38]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39]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M].1927.
- [40]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1]海防档[Z].
- [42]盛档·马建忠致盛宣怀函[Z].光绪十年五月初七,1884年5月31日.
- [43]唐有淦.从洋行买办到民族资本家[M].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珠海市香洲区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编印,1995.
- [44]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 [45][美]A·莱特.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志[M].伦敦,1908.
- [46]张耀中.珠海历史名人[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
- [47]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 [48]胡波.走向世界:中国近代史不可忽视的主题[J].学术研究,1994,(4).

(责任编辑:扬眉)